

A traditional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in ink and light color, depicting a wide river or lake with distant mountains and small islands with trees. The style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Song or Yuan dynasties.

苏轼人格与创作论略

王渭清
著

A red decorative mark, possibly a stylized '8' or a corner bracket, located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of the cover.

人民日报出版社

I206
138

宝鸡文理学院 2004 年科研计划项目(JK2402)

苏轼人格与创作论略

王渭清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轼人格与创作论略/王渭清 著.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1

(人民教师文库)

ISBN 7-80153-713-0

I. 苏... II. 王... III. 中国文学-文学评论和研究

IV. 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6504 号

书 名:苏轼人格与创作论略

著 者:王渭清

责任编辑:曼 熾

封面设计:仵军智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北京金台西路2号,邮编:100733)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大华山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142 千

印 张:6.6 印张

印 数:1-1000 册

版 次:2006年1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53-713-0/I·406

定 价:16.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苏轼人格境界文化渊源论	(1)
一、儒家文化与苏轼的人格境界	(2)
(一) 道：追求以道自任、旨在批评的独立人格	(6)
(二) 政：发扬仁民爱物、志在兼济的淑世精神 ...	(14)
(三) 学：创造性命自得、诚明得中的人格境界 ...	(19)
二、庄子思想与苏轼的人格境界	(28)
(一) 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	(28)
(二) 价值论上对“用”的超越	(32)
(三) 修养论上的静心养性	(33)
(四) 境界论上的诗性追求	(36)
三、般若中道智慧与苏轼的人格境界	(40)
(一) 般若中道思想在中土佛教典籍中的流播与阐扬 ...	
.....	(41)
(二) 苏轼作品中的般若中道思想管窥	(44)
(三) 中道智慧与苏轼天地境界的生成	(52)

第二章 苏轼创作佛禅情结论	(56)
一、佛禅与苏诗	(57)
(一) 诗学理论上的以禅喻诗	(57)
(二) 诗歌创作实践上的以禅入诗	(61)
1. 文本形式上运用禅语	(61)
2. 诗歌内容上的禅悦倾向	(64)
3. 以禅入诗对苏诗艺术特色的影响	(71)
二、佛禅与苏词	(96)
(一) 苏词化用佛语佛典考察	(96)
1. 用佛典而实与佛禅无涉者	(96)
2. 用佛典而意实相关者	(97)
(二) 苏词佛禅意趣	(98)
1. 谈论禅理	(98)
2. 抒写禅心	(101)
(三) 佛禅对苏词艺术手法的影响	(106)
1. 时空描写的圆融互摄	(107)
2. 咏物的不粘不脱	(109)
(四) 佛禅底蕴促成了清旷的词风	(110)
第三章 苏轼创作庄学渊源论	(112)
一、庄子精神对苏轼文艺创作思想的影响	(113)
(一) 培养审美心胸	(113)
(二) 追求自然的风格	(116)
(三) 重视技与道的并进	(119)

(四) 追求艺术的传神与远韵	(120)
二、《庄子》散文对苏轼文学创作风貌的影响	(124)
(一) 文本形式的化用	(124)
(二) 构思行文的模仿	(127)
(三) 诗意境界的追求	(131)
第四章 苏轼创作俳谐论	(134)
一、作为文艺美学范畴的俳谐	(135)
(一) 俳谐溯源	(135)
(二) 俳谐的文艺美学价值	(136)
二、苏轼创作俳谐之表现	(139)
(一) 自我解嘲	(139)
(二) 调侃打诨	(146)
(三) 批判性嘲讽	(150)
三、苏轼创作俳谐特色的文学史意义及其成因	(152)
第五章 苏轼散文文体形态论	(159)
一、文体形态的内涵界定	(161)
二、苏轼散文的体制类型及其创新	(165)
(一) 辞赋	(165)
(二) 论说	(169)
(三) 题跋	(173)
(四) 尺牘	(175)
(五) 杂记	(178)
三、苏轼散文的语体和体式	(181)

(一) 语体	(181)
1. 修辞	(181)
2. 语言	(184)
(二) 体式	(186)
1. 议论的明晰透辟、雄辩滔滔	(186)
2. 叙事的挥洒自如、摇曳多姿	(187)
3. 抒情的以理驭情、情理相生	(188)
四、苏轼散文的体性	(190)
(一) 表现对象的广泛性与深刻性	(190)
(二) 艺术精神的自由性	(193)
主要参考文献	(196)
后 记	(202)

第一章 苏轼人格境界文化渊源论

作为中华文化史上的一位世界级名人，苏轼一生历经宦海沉浮，既屡遭打击而又名满天下，进退出处、贵贱穷通无滞于心，在成就了辉煌的文化业绩的同时，完成了儒、道、释三教思想的圆融。在他的人格结构中，既有儒家的以积极用世、仁民爱物、刚健进取，又有道家的任真自然、齐物忘我、避世高蹈，以及佛教禅宗的自性空明、心无挂碍，以平常心看待一切人生变故。集奋进、乐观、旷达于一身，将中国传统士人的进与退、出与处和谐地统一，真正达到了宋儒所标榜的“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的境界。关于苏轼人格风貌的描述，学界已有不少论述，本章则拟从文化渊源的视角，探讨苏轼人格的结构要素，以及三教融合的思维机制。

一、儒家文化与苏轼的人格境界

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占主要统治地位的思想，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苏轼从幼年束发就学，学的便是儒家经典著作。《宋史》本传记载他十岁时，父亲苏洵游学四方，母亲程氏夫人亲授以书，苏轼“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成年后，“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可以看出他从青少年时代就打下了坚实的儒学根底，为后来入世进取、尊主泽民的人生实践和成为北宋蜀学领袖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尽管后来也曾受佛道侵染，人生态度趋向随缘放旷、超然物外，但作为传统儒士的兼济精神则始终贯穿了他一生的仕宦历程，另外儒家文化特有的内在超越的精神也对苏轼审美化的人格有一定影响。本节无意于对苏轼的儒家思想做全面的梳理，只想以“道、学、政”为逻辑起点来剖析苏轼人格精神中的儒家文化因素。

笔者之所以选取“道、学、政”三个字作为论述苏轼儒家文化人格的逻辑起点，是受了著名美籍华人学者，被誉为当代新儒家之一的杜维明先生的启示。杜先生在《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一书中指出：道、学、政是儒家《论语》的三个核心观念^①，笔者受此启发，进一步认为道、学、

^①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 页。

政是儒教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本体价值实现的三个基本要素^①。这个理解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道”是儒士（人文知识分子）人格价值生成的本体依据。人文知识分子的原型是巫，他们“集神使与人类代言者双重身份于一身”^②，是沟通天人的中介。当巫术文化解体之后，“人文知识分子体现为执掌意识形态的士人与教士，依然长期享有政教合一社会结构中的特权。”^③ 他们的祖师爷就是相传曾经制礼作乐的周公，周公所开创的王官礼乐文化体系传承着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到春秋时被崩坏，导致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文化遂由上层贵族手里转到受到良好的礼乐诗书训练而地位较低的儒士的手里。以孔子及其门人后学为代表的儒士们，作为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将人生理想投向了更广阔的人间社会，关注天下和现实，然而面对纷乱的时世，沉沦下僚的地位使得他们无法在政治上真正与王权相抗衡，于是，他们便把原本只局限于王道德治的礼乐文化精神发挥扩展为“道”，使其进一步具有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一方

① 此处的人文知识分子并非具有人文学科知识的人。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外来词，它起源于西方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其精神内涵是，是“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康德语），具有超越于个人的私利之上的关怀国家、社会的一种宗教担当精神，大体相当于中国文化中的士。所以我们就把以守护理性和价值为指归，具有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称为人文知识分子。

② 尤西林：《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与使命》，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页。

③ 尤西林：《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页。

面，这个“道”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能赞天地之化育，具有宇宙本体论意义；另一方面，这个“道”则弘扬着士人的主体道德精神，具有伦理本体意义。正如《论语》中孔子所谓的“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君子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食”（《卫灵公》）、“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泰伯》），“都是在强调士的价值取向必须以“道”为最后的依据。所以中国知识阶层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孔子便已努力给它灌注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的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①总之具体落实到士人人格层面，“道”就是一种无私无畏的理性的批判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宗教担当精神。

其次，“政”是儒士（人文知识分子）人格价值实现的现实途径。《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里的立功作为士大夫价值实现的目标，主要是通过从政来进行的，它是将个体纳入群体，通过政治行为为群体谋取幸福来得到群体认可，从而实现个体的人格价值。因为自董仲舒为汉武帝所提供的意识形态建设思路被逐渐付诸实施之后，儒士的生存方式在封建体制中也逐渐变成了被称为士大夫的政府官僚，从此，士在作为文化传承者的同时，更多的被作为封建贵族官员阶级的一员而出现在历史舞台

^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

上，儒生和文吏的融合使士大夫政治得以定型。^①在这种士大夫政治格局下，儒家知识分子从政势成必然。然而“仁政的观念是儒家政治学的基础。坚信道德和政治密不可分、统治者的修身和对人民的统治密切相关，使人们很难将政治理解为独立于个人伦理之外的控制机制”，“‘政’的语源是‘正’，含有显而易见的道德寓意。”政府的重要功能与作用是伦理教化，使得儒士作为知识精英的道德信仰能够轻而易举地影响人民大众。^②所以，儒家知识分子政治人格价值的核心就是通过施行德治仁政、经世济民，从而确证自身的价值。

再次，“学”是儒士（人文知识分子）个体人格达到内在充实、入门从政的必由之路。儒家知识分子之所以能成为士大夫，“学而优”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学的主要对象是五经。在这里，五经不仅仅是一种文献典籍，更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是相传为圣人所作而又经过历代集思广益的人文学。五经还代表着儒家对人类社会的一种观念，只有对五经的不断地、反复地学习领悟，德性才能伴随着学问与日俱增。德性、学问使道德人格之气达到“浩乎沛然”，也就成为从政的基础和凭资。因此，在封建社会的受人尊敬的官僚，大多数都是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文人。他们学五经中的《诗》、《书》、《易》、《礼》、《春秋》，在履行政治职责的同时，往往还身兼文学家或史学家、学者等多重身份。他们以自己在不同领域的文化创造业绩

① 这一融合的复杂过程可参阅阎步克《士大夫政治史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 杜维明：《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6页。

诠释或丰富儒学的要义，或采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①的方式外向开拓；或反求诸身，“穷理尽性，以至于命”^②，追求内在的超越。最终都以所谓“道德文章”实现主体人格精神的浩气长存。

正是在上述三个逻辑起点上，笔者抽出了儒家文化对苏轼人格境界形成影响的三个核心要素。以下试分述之。

（一）道：追求以道自任、旨在批评的独立人格

虽然说传道、明道、以道自任、自觉代表社会的良心，担当起辅佐帝王、以理性的态度反思与贬损不合理的统治，是历史上一切真正的醇儒人格价值生成的共同依据。但这种现象表现在北宋中后期知识分子身上却更为典型。而这一点实与当时孟子在儒家思想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上升相关。

自中唐韩愈重振儒学道统，孟子的名字开始被置于孔子之后，到北宋庆历之际，伴随着政治上求变呼声的高涨和“新政”的一度施行，思想界中出现了一股“尊孟”的思潮，其代表人物当首推范仲淹和欧阳修。范仲淹发挥了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标举“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宋代新儒家理想人格风范；欧阳修也认为“孔

① 《张载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6页。

② 《周易·说卦传》。

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①，极力推尊孟子；这一时期，作为北宋前期著名经学家兼教育家的孙复、石介师徒更从儒学思想发展的角度极力论证孟子的崇高地位的合法性，反复强调儒家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到孟子、扬雄、王通、韩愈，有一个圣贤相续的“道统”，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②自庆历而后，孟子升格运动进入了一个全面并且迅速的发展时期，到熙宁、元丰间达到高潮。此时学界出现的关学、洛学、新学、蜀学，虽在政治见解上分歧很大，但在“尊孟”这一点上是相同的。^③

孟子地位的升格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固然是影响了北宋理学的形成及其特征，但这一事件在北宋士大夫文化史上也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北宋士人在接受孟子学说的同时，也深受他那充满浩然正气的人格力量的感染，从而直接影响了北宋中后期士林风气的转变和儒家知识分子人格风范的形成。从庆历新政到熙、丰之际政治改革，再到元祐党争，士人身上不乏孟子所谓的那种不屈不移的人格光辉。他们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强烈责任感，有“左右天子，不动如山”^④的面对君权的独立意识，有“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⑤的博大襟怀，

① 《与张秀才秉第二书》，见《欧阳修全集·居士外集》卷十七，余冠英等主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98年版，第1295页。

② 参阅徐洪兴：《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102页。

③ 同上书，第104页。

④ 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

⑤ 《张载集·乾称第十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2页。

有为改变现实，挺身而出，祸患不避的淑世精神。文莹《湘山野录·序录》中记载范仲淹屡次上书言事而遭贬谪，每遭贬出京，同僚朋友不避朋党之嫌，为之设宴饯行，时人赞叹范仲淹虽贬而荣；又据《宋史·范仲淹传》记载，在范仲淹被吕夷简等以朋党弹劾而获罪之际，尹洙径直上书仁宗，自称与仲淹有师友之谊，自己曾受其荐举，故自愿降职。与此同类的事例在宋代史料中屡见不鲜，足可见出宋人为申大义而不避祸患的磊落之志，而隐藏在这种现象背后最本质的文化心理机制就是：宋人在对儒学道统的坚守和弘扬中建立起了与王权相对抗的话语权力，以追求至善至美的圣人之道（理）来规范和约束具有至高无上性的君主之权力（势），并以辨证的态度来处理“理”与“势”的关系，虽然他们也曾承认君主之势最尊，然“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①。通过体道、传道、施道，使宋儒获得了无穷的人格力量。是否能承载和守护“道”，成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志，正所谓：“有其道而无其名，则穷不失为君子；有其名而无其道，则达不失为小人。”^②通过对“道”的优越性的认识，宋儒进一步实现了对自我身份的确

① 吕坤：《呻吟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转引自苗田、赵冬梅：《宋代士人的人格精神与“道”》，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2003 年第 2 期。

② 穆修：《答乔适书》，《穆参军集》卷中，四库全书本。

认,并进而对政治伦理原则进行新的限定:“立君者,天也;养民者,君也。非天命之私一人,为亿万人也。”^①“至于君,虽得以令臣,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二于道而曲从。”^②也正是基于对君臣关系的这种认识,范仲淹极力称赞在辽宋澶渊之战中力主真宗亲征的寇准能“左右天子,不动如山,天下谓之大忠”^③,王安石执政时与神宗“若朋友,一言不合者,必面折之,反复诘难,使人主复若乃已”^④。宋儒通过对君臣关系的这一界定,使忠君被纳入行道的自觉,遂很好地保证了从命他人与维护主体自我之间的平衡。^⑤

作为一名儒家知识分子,苏轼也是在上述文化思潮中士人的典型之一。幼年时,就将古之圣贤与历代名臣奉为楷模,“始知读书,闻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⑥苏轼在《范文正公集叙》一文中,记他总角入乡校时,即由乡先生口中得知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为当世人杰,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据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记载,苏轼十岁时,其母为读《后汉书·范滂传》深深地激励着他,由是“奋厉有当世志”。在他本人的一些诗作中也流

① 李靓:《安民策十首》,《盱江集》卷十八,四库全书本。

② 罗大经:《鹤林玉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页。

③ 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第237页,四库全书本。

④ 刘安世:《元城语录》,丛书集成初编本。

⑤ 苗田、赵冬梅:《宋代士人的人格精神与“道”》,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⑥ 《上海直讲书》,见《苏轼文集》卷四十八,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385页。

露出早年的远大抱负，如：“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①“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然。……丈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②这些早期心理积淀以及后来对儒家经典的深入研读成为他士君子人格形成的基础。在从而使他的思想和行为中呈现出一种以道自任、以道事君、志在批判、勇于担当的独立不迁的士君子人格。具体又从以下两方面来看：

1、勇为帝王师，坚守“道高于势”的原则

孔门儒学认为，出仕是儒者的士君子的天然义务。这一点在《论语》中不乏记述，如子路曰：“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微子》）“行义以达其道。”（《季氏》）可见，出仕作官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为了行道。

苏轼去世若干年后，宋孝宗赵昚为其平反，追赠“太师”的封号，如果对一般人而言，这个“太师”也许是个虚饰之名，但对苏轼来说则是货真价实的。他的一生以道自任、以道事君，的确尽到了为帝王师的义务。这一点从他文集中大量的给皇帝上书的札子、表章中足以得到证明。而且这些议论文章文辞犀利、锋芒毕现，甚至逆批龙鳞。

如在熙宁四年（1071）苏轼三月内连上三书，均是冒死诤谏之言。先是正月宫廷下令于元宵节前低价收购浙灯四千余盏，禁止民间浙灯私自买卖。时任代理开封府推官的苏轼，认为这种做法是对民间的无理盘剥，于是直言奏上《谏买灯状》，阻止这一不合理的政策。其实，按他的职分来说，与此

① 《和子由苦寒见寄》，《苏轼诗集》卷五，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5页。

② 《屈原塔》，《苏轼诗集》卷一，第22页。